



創作餘談

廣西人民出版社

陆
地

创作余谈

广西人民出版社

创 作 余 谈

陆 地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7.25印张 插页2 179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7,200册

书号: 10113-221 定价: 0.75元

编 前 的 话

一九四七年在哈尔滨编《东北日报》副刊时候，为了同爱好文学的青年们探讨文学学习上的一些问题，曾在副刊开辟一个叫做“阅读与写作”的专栏，一星期发表一篇，连续了十三个星期。引起不少青年朋友的兴趣。三联书店哈尔滨分店（当时叫光华书店）负责人邵公文同志和作者商量：为了迎合青年读者要求，普及文学写作的常识，想把十三篇东西集成了一本小册子。结果，叫做《怎样学文学》的单行本，在东北解放区出了版，得到广泛发行。一九五〇年到广州，发现这本小册子竟被设在香港的三联书店当作《新中国百科小丛书》之一，分别在香港、上海出版。看来，当时在解放区以外的青年读者，也有欢迎这样的读物的。五十年代虽在宣传部门工作，多少也还接触到文艺方面的问题，讲过一些话，还整理成了文章在报刊公之于众。出版社要把它编成书，于是，从原来《怎样学文学》小册子里头，检出那些仍有参考意义的篇章略加修正，合编成一本《写作杂谈》，一九五九年作为建国十周年纪念出了版。经过十年动乱，江青、姚文元的文艺谬论终于被揭穿了，文艺思想上的混乱亟待澄清，特别是广大的文学爱好的青年朋友，要求这方面的知识更为迫切。座谈会要讲话，报刊编辑登门索稿，读者来信要求解答写作问题，等等，逼着老牛拉车，不得已而勉为其难；几年来，在创作之余，多少讲了些话，写过几篇简短的文字，答复过几封来信。

现在，把一九四七年以来断断续续发表、出版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统统收集在一起，加以修改整理，合成一本《创作余谈》，献给青年的文学爱好者，作为学习的参考。其中分为两辑，第一辑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九七七年以后的编为第二辑。

客观世界永无休止地在运动，立论难得周全、确当，昨天的话未必符合今天的思潮。特别是以往某些左的观点概念，显然是不足为训的。为了如实反映当时历史的政治思潮，有些地方只好仍留原样，以作教训。

作者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目 录

编前的话	(1)
------------	-------

第 一 辑

写作杂谈	(3)
生活·理论·技巧	(12)
普及·提高	(20)
写给在农村的同志们	(24)
论作家与人民	(27)
塑造我们的“当代英雄”	(45)
新的历史，新的文艺	(51)
写什么？	(58)
生活素材的搜集和储备	(68)
艺术的加工、剪裁、提炼	(71)
表现的形式	
——语言的筛选	(75)
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执行“时代的 革命的命令”	(83)

第 二 辑

排除路障，迈开步伐	(99)
在一次学习会上的发言	(104)
迎新	(113)

漫谈深入生活	(116)
刻苦钻研技巧, 发挥独创精神	(121)
简论文艺与政治	(128)
创作三题	(134)
一、主题与题材	(134)
二、生活素材与艺术加工	(136)
三、故事与人物	(140)
谈谈写小说的体会	(145)
我是这样摸索过来的	(154)
坎坷的道路	
——答黑龙江《创作通讯》问	(160)
生活·创作·党性	(168)
在黄飞卿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	(174)
“故人”何在?	(187)
《瀑布》后记	
——一本书引起的话	(191)
题记	
——《故人》(短篇小说集)序	(195)
创作余谈	(197)
漫话文学创作与天才的关系	
——文学信札之一	(202)
写作有没有窍门可走?	
——文学信札之二	(207)
问题在哪里?	
——文学信札之三	(211)
附录: 解放思想 加强团结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在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15)

第一辑

写 作 杂 谈

一、从写信说起

在生活中，各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体会：有时候为一个军属写家信；有时候给同志谈工作；有时候甚至替旁人写情书。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书信吧，完成这样的任务，总不是那样“得心应手”，费好大的劲也不易寻找到恰当的字眼；即使把好听的美妙的句子都用上了，终究感觉不是味道，好象穿错了别人的衣裳似的，总也免不了造作的客套。但是，你要是给自己的知心朋友、爱人写信，那，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能把信写得自然、亲切。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是因为你跟对方有着深切的感情，熟悉对方的思想情况，知道同他应该谈些什么。

这道理，可以联想文学创作上的问题。

有些人往往用好大的精力去写，但他的作品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样的完美，甚至还成了概念的东西。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所写的人物还不成为作者的知己朋友或心爱的人。写它，乃是为了尽义务，为了出名。如同替旁人写家书或工作上来往应酬的公函一样，结果当然不会产生真正为人民所喜欢的作品。

人民所需要的文学艺术作品，是诉之于感情的东西。通过感情

的爱恶，反映人们斗争的生活，表现英雄人物的道德品质，在思想感情上鼓舞人们前进。假如你不是在人民斗争的生活中长大，假如那些新的英雄人物不是你多年的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对他们产生深厚的感情，那末，即使写出人物来，恐怕只是干巴巴的概念，感情上是感染不了读者的。

通常在这样情况下，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头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应该怎样深入生活，而不是写作。

深入生活，改造思想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给我们作过启示，然而，各人接受的程度不同，实践起来就很不一样。有人到斗争生活中去了，仅仅站在一旁作冷静的观察；仅仅记录人物的表面形象，仅仅临摹自然环境的色彩和搜集一些方言土话；至于人物的内心活动，却用探听追问的方式去取得的。并不是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生活的海洋；不是以无限的热爱去拥抱新的生活。在人民群众中并没有结交上知己的朋友，没有同他们发生着深厚的感情。当然，文艺不能单纯的表现爱，不能只是歌颂正面的生活，对落后的、反动的一面，同样是要憎恨的。但是正因为没有对新生的、进步的人物的热爱；对于旧的、落后的东西也就不可能产生应有的憎恨。

如果说，曾经有些作家写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往往容易成功，那末，除了由于他对人物的熟悉之外，还有重要一点就是作者对他的人物由衷的热爱。因为他爱她们，以至梦寐难忘，才会有描绘她们的冲动，写起来才会亲切感人。

爱一两个朋友，爱自己的亲戚，爱自己的妻子儿女，谁也有这点小天地的。可惜这点小天地过于狭窄了，那里的悲喜很少能够感染广大的人民，那里很少有其典型意义，假如作者本身不是成为斗争生活中的一个战士的话。

有一位名人讲过：作家是他本阶级的代言人，是阶级的眼睛。他的爱憎应该是代表着阶级的感情。也只有这样，他的作品

才能为人民所接受。如果我们的出身是从资产阶级来的，现在也还没有投身于人民斗争的行列，那末，对人民群众这种“爱”的感情的培养，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一定的政治修养，和思想的锻炼和提高；在实际生活中需要成为主人的情感。因而必须在工作当中同周围群众真正交了朋友。这样才能储备丰富的生活的“资本”。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米做不出饭。同样的道理，修养再高明、技巧再熟练的大作家，当他一旦失掉了生活的源泉，那，他的创作生命也必然随之而告终，不可能再给读者们编出新的故事来了。

只要有米，做饭是容易的。只要有生活，写作的技巧也就不难了。

二、道路在哪里？

我们曾经讲过：要想把作品写好，不但先熟悉他所写的生活，并且还得对它发生热爱。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想得到：自己跟自己的亲戚、朋友，总是有着比较浓厚的感情的。那是因为有的从小就受着对方或给予对方以无限的恩爱抚养长大起来的，比如父母儿女之间；有的同在一个家庭里长大，有着长久的岁月共同生活，经历过共同的命运，有如兄弟姊妹；有的则经常有接近的机会，比如一些表亲。至于朋友和爱人，那是由于互相间有着深切的了解，所谓志同道合，能够患难相助，痛痒相关。正如一位名人说过“结婚是两个人命运的同盟”。总之，不论是亲戚，还是爱人，或者是朋友，他们互相间的感情，必须是在相互熟悉和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

所以说，作者对他的人物，必须有相当长时间的熟悉和了解过程，必须跟他的人物一起奋斗过来，分担着同样的悲喜，有着

一致的利害观点，然后才可能发生真实的情感。

为了达到这样要求，我们曾经有不少的人深入群众生活，同他们共同参加了斗争，这应该是正确的道路。不过，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拿土地改革运动来说，有的人从头到尾整个过程都参加了。时间最短的都有半年，有的甚至经历了两三年之久，而且还跟农民实行了“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他们并未能因此而把作品写好；有的简直写不出什么来。终于，下面一连串的疑问就来了：“我这样做还不算深入生活吗？经历那么长时间还能说时间太短吗？为什么不能深入人心，不能揭开人们的内心世界？写起东西来，就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呢？”

这里必须得谈谈怎样深入生活的问题。

的确，我们中间是有不少的人曾经参加过各种群众的斗争生活的，而且有的人今天仍然生活在群众当中。为什么在他写出的东西里头，见不到那些曾经同他一块生活过来的人物的面貌？或者他自己在构思的想象当中，那些人物不能同自己的亲戚朋友那样，鲜明而生动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这里，用得着我们追问一下了。请问：“当你同群众在一起的时候，你的‘心’是否也跟在一块？”如果我们参加土地改革是被迫的，是派的公差，人去了，思想却没有跟上；如果我们参加土地改革仅仅是为了自己得到写作材料，对农民要求翻身，要求得到土地的情绪，我们并没有同感；如果我们同农民“三同”是为了工作团队的纪律，不得不遵守，思想感情却没有真正跟农民“同”起来。最糟糕的，如果自己对土地改革政策都发生怀疑，见地主装穷叫苦的时候，还流露着怜悯；形式上同农民相去咫尺，感情思想上却如隔天涯，那怎能体会到群众的精神生活呢？如果抱着这样态度去深入生活，结果必然是：对新生的、进步的事物既不发生热爱，对那些腐朽的、反动的东西也不会憎恨的。虽然土地改革运动是轰轰烈烈，那些翻过身

来，阶级觉悟提高了的农民虽然那样生龙活虎地以主人公的姿态，走上了政治舞台，……这些现实虽然在生活中是触目皆是。但，这些珍贵的形象在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却淡薄而模糊的。什么道理呢？从思想根源去探讨，就是由于立场没有移过来。因而，人民群众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斗争，在你看来，并不是那样可爱，脑子里就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因为要写作品了，才去翻开笔记本找材料，那，写起东西来，必然是捕风捉影，既看不见也抓不住。勉强写出来了，也只能是些生硬的死尸，只是概念化，公式化的模型，不可能再现出有血有泪、有说有笑的人物来的。

那末，正确的道路在哪里呢？我以为当我们到人民群众生活中去的时候，就必须是同回到自己的家一样：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好的或坏的大小事情，都应该看成同自己家里所发生的一样，感到与自己有切身的荣辱关系。必须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把那里的工作做好起来。那里的新人物，他们的每一件那怕是最小的成就，都应该把它看成是给全体人民增添着财富，是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往前发展的一分力量，首先应该得到我们敏感的文艺工作者所热爱。至于那里人物在工作中的某些过失和缺点，那都是革命事业的损失，我们应该义不容辞的、尽可能的帮助把它补救和改正，指引他们走上光明而远大的目标——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对于那些显然是反动的、落后而有害的事物，应该引起憎恨，给予严厉的批判和回击。这样一来，当我们深入生活去的时候，就不会是一个冰冷的旁观者，而俨然是生活里的主人，抱着满腔热情以战斗者的姿态参加斗争的行列。

今天我们是处在英雄的一代，到处都出现着为创造人类幸福生活，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不顾身，全力以赴的英雄。我们文艺工作者本身假如有着那样崇高的英雄的感情，有着那样宽阔的胸襟，那末，到处都会遇到伙伴，到处都会结交到真挚的友情的。也只有这样，你才可能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

既然，我们在人民群众中，和新英雄人物结交了朋友，洞察他们的思想感情；既然，这些新人物成为我们文艺工作者梦寐以求的人了，要描写他们的话，不就跟朋友写信似的，觉得自然而亲切了吗？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得认真的来温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话：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痛苦的磨练。”

接着，“讲话”还说：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

这两段话，应该是我们努力于艺术实践的指针！

我们一定得把立场站到工人阶级方面来，然后，我们的观点、思想和感情，才可能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思想和感情取得一致、融洽；然后，才可能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找到你的“家”，见到亲人、交上朋友，也才可能写出新的英雄来。

三、打开生活仓库的钥匙

一位机车司炉同志写信来说：他“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在留心观察，但是，总也找不出令人满意的、正面的、完美的人物作为写作的题材”，接着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是他那里一个年老的司机，工作一贯积极，在行车中，“那怕只有一分钟时间”，他也去做检车工作，“在生产上的确是很突出的

人物”，但有时他又发牢骚。因此，我们的司炉同志就感到“所遇到的丰富而多样的现实生活中，足以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很少。”

同这位司炉同志这样看法的，恐怕还不是个别的人吧？把问题提出来谈谈，是必要的。前面曾经讲过：为了真正达到深入生活的要求，作者必须越过生活的现象，洞察到他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作家必须跟他的人物的喜、怒、哀、乐的感情起共鸣。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作者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如果你不是站在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你当然就不会理解那些积极工作的在生产上很突出的人物，其本质就是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你如果不是站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立场，你就不可能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一样：对紧张的劳动感到光荣以至达到忘我的境界；你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你就必然在观察事物方面，往往为某些现象所迷惑，不可能在某些人物发牢骚、讲怪话的片面的、一时的缺点和过失的现象当中，窥探到里边深藏着的优良、崇高的品质。同时也就不可能在他说的“工人今天当家作主，我们应该这样做”这句话，辨认到这是代表他工人阶级觉悟的新的思想、新的道德品质，是带有典型性的因素。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真的万花缭乱，错综复杂的东西。如何在那里边去分辨哪些是现象，哪些是本质？如何去认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矛盾？如何去认识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方面？如何去认识客观法则的发展规律？这，上面已说过，那是决定于立场观点的正确。而正确的立场观点的获致，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中得到必要的武装。列宁讲过：“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才能使人们得到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只有科学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才可能成为帮助我们打开现实生活的钥匙。换句话说，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才能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有人

说：“作家一旦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他就可以更深刻、更清楚认识现实中的各种现象，就可以瞻望他们的远景。”这应该是促使我们醒悟的劝告。

大家都知道列夫·托尔斯泰给我们写出许多好的小说。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他说过这样的话：“在艺术上被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源源的活水’”；跟着，他还谈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使他“在阅读生活的书本时，有了目的性和方法”。再说，我们好多人都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中，得到有益的教育吧。而这本书的作者能够把它写出来并不是跟劈一堆木柴那样容易啊。我们听他怎样说罢。他说：

“我经过了顽强的学习，我已用革命斗争的理论知识武装了自己，因而我能够把自己的经验概括在各种艺术形象之中。”

接着他还说：

“必须学习，必须获取生活中的深刻知识，必须了解世界文学艺术中的优秀作品，以扩大自己的眼界，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照亮自身的经验，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勇敢地拿起笔来，综合自身的观察，创造出有价值的作品来。”

这是作家根据多年来亲身的经验，给我们提供的宝贵意见。这就充分证明：马列主义理论对写作思想的指导是有其多么重大的作用。

为了我们的文艺创作能够本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能够很好地完成它的任务——写出为人民群众所热爱的作品，创造新的英雄人物，足以作为旁人学习的榜样。在解决了深入生活的问题之后，第二个问题就需要文艺工作者不断的提高自己思想水平，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

所以，必须在这里向大家提醒：当我们深入到实际生活当中去的时候，除了自己的“心”（思想情感）也跟在一起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之外，还得需要把马列主义这把钥匙带着。然后，才